

留学安全 牢记在心

本报记者 孙亚慧

美国当地时间11月9日下午，芝加哥大学附近街区发生一起恶性持枪抢劫案，一名不久前毕业于芝加哥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不幸遇难。这已经是芝加哥大学附近今年以来发生的第二起中国留学生被枪击身亡的事件，就在今年1月，一名正在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在一起连环枪击案中不幸身亡。

面对令人心痛的悲剧，如何保障留学生的人身安全再次成为公众关注焦点。

乌云笼罩芝加哥

枪击事件发生后，11月11日，中国驻芝加哥总领馆发布《对领区中国公民加强安全防范的提示》，强烈谴责滥杀无辜的凶残犯罪行为，并要求美有关方面尽快查清和公布案件情况，并采取切实措施，保护包括中国留学生在内的中国公民的安全。总领馆同时提醒领区包括中国留学生在内的中国公民，要密切关注居住地治安状况，注意及时了解当地发布的安全预警信息，避免前往不安全地方，进一步提高风险意识，加强安全防范，确保自身安全。

正就读于芝加哥大学研究生二年级的中国留学生海希（化名）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这场枪击事件发生后，身边中国留学生的出门频率大幅下降，可以在家上网课的学生则尽量减少了去学校的次数。不得不前往附近超市采购时，大家也会结伴同行，避免独自出门。

芝加哥大学校长保罗·阿利维萨托斯在枪击事件发生次日发布视频，对事件中不幸遇难的中国留学生表示哀悼，同时表示，目前芝加哥正在制定方案，提供针对海德公园和周边社区短期以及长期的公共安全战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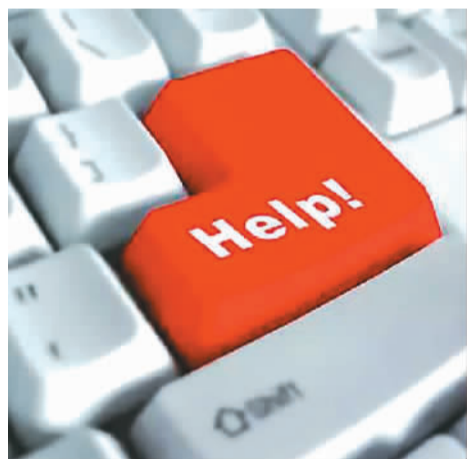
但这样的努力最终究竟成效几何，一些当地的中国留学生表示怀疑。

“类似这样的悲剧发生时，当地会增加学校周边警力，校方也表示会增强安防力量，但我感觉没有太多实质性的效果。这也是为什么这次事件发生后，一些学生反应特别强烈的原因——枪击事件很难被杜绝，让学生们十分缺乏安全感。”同样就读于芝加哥大学的中国留学生李越行（化名）对记者说。

理性应对恶性犯罪

海希告诉记者，就在前不久的万圣节清晨，她所在的学院就有教职工遭遇歹徒拦路抢劫，如今又发生了如此恶劣的枪击事件，这令她和同学们感到很难接受。

作为久负盛名的私立研究性大学，1890年由“石油大王”约翰·洛克菲勒创办的芝加哥大学曾诞生过著名的“芝加哥学派”，但这里猖獗



的犯罪和枪支暴力也成为学生的心头之患。根据芝加哥警方相关数据显示，截至今年11月7日，海德公园及周边地区共发生枪击事件超130起，比去年同期增长了44%。

面对频繁的凶残犯罪行为，尤其是手持枪械的歹徒，学生如何最大化地保障自身安全？

在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编制的《留学美国安全手册》（以下简称《安全手册》）中，“社会治安”这一章节中按照诈骗、抢劫、盗窃、性侵、绑架、谋杀、枪击等几种犯罪类型逐一讲解，提醒学生提高自我防范和应对能力。

根据《安全手册》中的防范提醒，学生尽量不要外露个人财产，防止被尾随或预谋抢劫；如察觉被人跟踪，尽快前往商场等人多、光线充足区域。如确定被人跟踪，用脚踏路边的停车触发报警器，或随身携带可供吹响的哨子，引起他人注意。一旦遇到抢劫案件，保持冷静不盲目抵抗，牢记安全为先；留意并记住抢劫者外貌特征、持有的武器特征、汽车型号与车牌号等；注意保护现场证据，如有目击者，请其一同等待警察前来，或留下其电话也便警方联系取证。

李越行曾于去年圣诞节在其住所附近遇到过歹徒拦路抢劫。他告诉记者，面对持刀歹徒，他直接掏出口袋里的钱包交给对方，歹徒得手后立刻逃离现场，没有伤害他。李越行随后立刻报警，向警方描述了歹徒的主要外貌特征。

“现在回想起来我还是觉得万幸，如果歹徒有进一步过激行为，结局很可能会不一样。”李越行说。

安全意识不松懈

对安全隐患的担忧，也给当地留学生的生

活心态造成了影响。海希身边不少刚来芝加哥没多久的中国留学生，正计划即便支付高额违约金也要搬离在海德公园附近的住处——枪击案就发生在海德公园附近。

“今年初那起枪击案发生后，我们紧张了一阵子，保持高度警惕。但是后来时间长了，就容易松懈，想要长期保持高度紧张的状态非常不容易。”海希说，许多学生都下载安装了一款名为“citizen”的安全类APP，这款应用可以随时提醒用户周边所发生的犯罪事件或安全事故，用户也可以上传周遭危险情况，供警察调查处理或解除警报。

“刚安装这款应用的时候，我还会被它频繁推送的内容吓到，就在离我们很近的地方，可能一晚上都会发生几起抢劫事件。一开始大家还会讨论，觉得情况怎么这么严重，但后来就变得‘习以为常’。”她说。

海希告诉记者，就在两周前，他们同学一行三人开车去超市采购，回家后大家下车从后备箱搬东西，司机一侧的车门并没有关闭。一位本地女性正好开车路过，她摇下车窗非常严肃地提醒海希一行人：“以后千万不要开着车门去后备箱搬东西，这样非常危险，汽车很容易直接被抢！”路人的提醒让海希和她的同学感到后怕，“可能就在我们松懈大意的某一刻，危险就会发生，之前所有小心翼翼的努力都将失去意义。”海希说。

“不出门”成了此时一些当地中国留学生的无奈之举，一些原本向海希咨询芝加哥大学申请的师弟师妹，也打算更换留学院校或城市。

海希说：“我自己是在两年前收到的录取，那时候芝加哥还没有像现在这么突出的安全隐患，如今，安全问题已经极大程度影响了我们的留学生活。人如果一直处于精神紧张的状态，时刻紧绷着神经，则负面情绪就会逐渐积累，心理状态就容易走向消极。”



我叫刘燕，是一名今年8月刚刚在芬兰毕业的政治学博士。国内硕士毕业后，我入职一家上市教培公司工作，工作4年间压力非常大，得到了很多，也失去了不少。在快节奏的工作节奏中，我逐渐迷失了内心的方向，接踵而至的是颈椎病、脂肪肝和抑郁症，它们逐渐成为我高效工作的副产品。于是，我在31岁那年，决定辞去工作，出国读书。

在芬兰的学习时光虽然平淡，但是真实。有笑亦有泪。

我的专业是政治学，在和教授以及同事们讨论的过程中，我看到了各国不同的政治制度和行政手段。君子而和而不同，芬兰学者独立的人格和大学里互相尊重的学习氛围使我受益匪浅，也渐渐适应了友好亲切的国度。

与欧洲其他国家相比，芬兰的学术氛围更加平和务实，学者的包容性更大。我所接触到的学者和老师都有意愿、有耐心倾听从我的视角剖析出来的中国政治，而不是固执地相信网络上西方媒体的片面报道。这种质朴求真、不带刻板印象的学术理念，才是真正的专业素养。有趣的是，芬兰的重金属音乐一直受到国民追捧，在我们学校，就连专搞学术的院长也酷爱摇滚乐，下班之后会直接抱着吉他去酒吧“嘶吼”。也许，这种“歇斯底里”的音乐只为释放压力，因为人们并不会把它带到工作中来。

留学期间，我常常跟学者和老师分享自己的观点，消除一些人对中国治理模式的疑问。比如，曾有同事给我发来几个新闻链接，询问如今新冠肺炎疫情下，中国的经济复苏是不是真的。我向她展示了中外媒体报道的相关经济数据，又把中国驻芬兰大使馆多次组织线上防疫讲座和给全体中国留学生发放健康包的视频发给她，还送了她两包中国使馆派发的口罩。该同事非常感慨，她表示，除了中国，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如此高效和人性化地关爱海外留学生，她还将这些案例写在了去年发表的文章里。



一个政治学博士眼中的千湖之国 口中的中国故事

刘燕

二

用3年半的时间完成4年学制的博士课程，对我这个“大龄青年”来说不是件轻松的事情，感谢一路走来良师益友的鼓励，让我有勇气面对人生的挑战。

在攻读期间，除了完成学业之外，我延续了教培机构英语老师的工作。在给学生们远程上课的过程中，我不仅可以听到朝气蓬勃的读书声，还可以听到万里之外国内的啾啾鸟鸣。非常感谢我的学生们，在黎明朦胧的天光里，在夜深人静的月光中，都有我们互相学习、互相鼓励的印记。

2019年，我还在芬兰兼职做了几次导游，带队的过程中常有人问：你都读到博士了怎么还来当导游？我回答：“要不是读到博士了，还没资格给你们当导游呢！”大家都笑了。其实，这是我的肺腑之言，读万卷书和行万里路都是生命中不可或缺的内容。

刚来芬兰的前几个月我非常不适应，从早到晚九儿乎连轴转的工作节奏中抽身，紧绷的神经却没有马上松弛。因此，我体会到的不是轻松和愉悦，而是迷茫。

“我是不是还有工作没有完成？”“下一次考核是什么时候？”……

为了填补这种恐慌，我把自己的时间表安排得满满当当，不给自己一丝喘息的机会。然而紧锣密鼓忙活了两个月之后，我发现同事们都在慢节奏地生活：下午三四点钟开始陆续下班，甚至到傍晚6点连教学楼的楼门都锁上了。几乎没有人会占用休息时间工作。我一边疑惑，一边也试着放慢节奏，试着放下工作，用眼睛、用心去感受外面的世界。

三

作为一个标准的山东学生，我上学期间一直埋头于书山题海；毕业工作后的几年也是在急急忙忙的节奏里度过。而在芬兰这种宽松环境中，看似付出的时间很短，却能够以劳逸结合的方式，给自己沉淀和思考的时间。埋头赶路的时候，也总要看看沿途的风景啊。

来芬兰之前，我背包走过40多个国家，走过壮阔波澜的大海、走过喧哗嘈杂的城市，在“千湖之国”，我看到了不一样的自己。

在宁静的湖水中、在清澈的星空下、在绚烂的极光里，我听到了内心温和而坚定的声音。我想，这就是在芬兰学习、工作和生活的意义所在。（作者系芬兰于韦斯屈莱大学政治学博士）



今年8月，刘燕（左二）顺利通过博士论文毕业答辩。（本版照片均由受访者提供，插图来源网络）

祖父的校园情

林实

祖父林祖欢生长在一个诗书传家的教育世家，祖父的祖父是一个思想进步的清代举人，在福州创办女子职业学校和幼稚园。他常教导子孙：“读书救世，不是为官。”祖父自小就知书明礼，深受儒家传统教育和“放眼世界”的思想影响。1924年，祖父积极参与旅欧勤工俭学运动，远渡重洋，前往比利时沙勒罗瓦劳动大学求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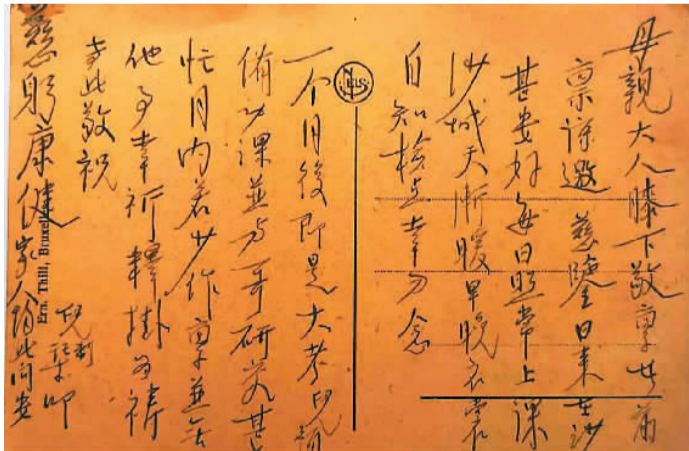
我的家中珍藏着一张祖父未曾寄出的明信片，这张明信片是他上世纪二十年代远赴比利时勤工俭学时，在富有革命传统的沙勒罗瓦劳动大学写给他的母亲的。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祖父对母亲的情感在这封简短的家书里，透过笔墨可见一斑。明信片上这样写道：“沙城（比利时）天渐暖，早晚衣裳自知俭点，幸勿念。”祖父请母亲不必为自己挂念，自己一切都好。“一个月后即是中考，儿须备功课，少作禀并无他

事，祈释挂”。寸草春晖，远行儿子微薄的慰藉报答不了母亲的深情，这是祖父的小家情结。如同许多那个年代的海外学子一样，他们带着亲人的思念离开家乡，上下求索，奋发学习，只为有朝一日学有所成回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1907年，德国医生埃里希·宝隆在上海创办的德文医学堂，于1908年改名同济德文医学堂，是同济大学前身，祖父从比利时回国后长期在这里任教。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于德法对立，上海法租界以学堂是德国产业、防止德国人利用该校机械制造武器为由，接管学校成立中法国立工学院。1940年，由于法国政府深受二战影响，无力再支持该学院继续办学，致使学校陷入困境。1943年，祖父联合在校的8名教授挺身而出开展护校运动，以校友的名义成立“校友会复校运动委员会”，迫使占用学校场地的人侵者退还校舍，以民办中法高级工业职业学校（中法高工）的名义开设机械、电机、土木三科，祖父担任校长。其间，他艰难办学，保护了教师、学生的利益。



祖父林祖欢在比利时留学时写给母亲的明信片（未寄出）。

当时的中法工学院是蔡元培先生领导的华法教育会推动创立的，许多勤工俭学回国留国的学子也都在这里任教，在祖父的带领下，学校十分注重实践技能的培养，和沙勒罗瓦劳动大学一样，校园内就设有校办实践工厂，学生可以边学习、边实践，基本上实现了厂校融合的办学格局。同时，学校一直坚持小班授课，因此尽管办学困难，但学校的教学质量一直广受肯定，被称为办学“有栋梁气”。

在动荡的社会环境中，办学事务十分繁杂，1945年，祖

父积劳成疾，病逝在任上。

而今，校园已历经百年沧桑，上海理工大学中英国际学院就设在这里，中西文化教育的交融在这里继续奏响。祖父的一生致力于发展职业教育，探索的是用教育改进实业，培养出一批具备职业技能的人才。几十年后，我和我的家人也践行着祖父当年的精神出国学习，之后又回国参与祖国建设。正是这份几代传承的力量，不断激励着我们奋勇向前。

（作者系福建闽江学院特聘卓越教授、九三学社中央医药卫生专门委员会成员）